

从“乌卡时代”到“巴尼时代”： 国际传播韧性机制构建的三重进路

周 敏 鄧 慧 滕文强

【摘 要】在全球生态从“乌卡时代”向“巴尼时代”的场域迁移下,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难以预测,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还需要处理内部的焦虑和不安。构建国际传播韧性是适应“巴尼时代”内外部风险交织的理论和现实通路。本研究通过对“韧性”核心要素的考察及其与国际传播系统的结构性耦合,认为“韧性”是理解国际传播系统生态的关键视角。在“韧性”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建构出国际传播韧性系统框架,并从“适应力”“恢复力”“可持续力”的三重进路,提出应实现国际传播与个体认知图式的匹配,以“持续型信任”扩展“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传播“痛点-痒点-兴奋点”的循环演化。

【关键词】乌卡时代;巴尼时代;国际传播;韧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今国际传播生态已非具有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乌卡”(VUCA)所能指代。后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演进,使得传统和新兴风险的涌现,加剧了世界各地感受到的生活危机,描绘了一幅不确定的时代和动荡的生活图景,新的“不确定性复合体”(uncertainty complex)正在形成^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多重交互的情境下动态变化,引发非线性、系统性、意外性的后果^②。在全球系统处于内外因素交织影响的当下,国际传播系统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相嵌入,亦受到个体心理和认知要素的振荡,逐步向以“脆弱性(Brittleness)、焦虑性(Anxiety)、非线性(Non-linearity)和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为特征“巴尼”(BANI)场域

迁移。

沿着传播的基本构成要素,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效果等环节进行划分和梳理,是国际传播研究中以传播过程作为分类标准的惯常尺度,但该方式将各传播要素视为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难以从过程性(process)的维度适应外部环境和公众心理双重变化的全新场域。从传播的流动性、过程性的取向上,可将韧性的概念引入国际传播,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向度。在以传播为中心的韧性理论中,韧性被视为一个过程,因为传播过程是动态的(dynamic)、递进的(recursive)和迭代的(iterative)^③。韧性视角下的国际传播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不间断性等特点,且具有延展性和趋势性的传播行为与过程,以力求最终达到传播意图和效果^④。换言之,国际传播需将重点从寻求系统理想状态和最大效益的决定因素转变为对于“韧性”的分析,同时注重国际传播系统的适

应性和可持续性的过程。

那么,在国际传播的场域迁移下,如何构建国际传播的韧性机制?这一问题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全新视角和学理依据。基于此,本研究将沿着如下逻辑展开论述:首先,以“乌卡时代”向“巴尼时代”的场域迁移为背景,提出构建国际传播韧性是适应“巴尼时代”内部与外部风险交织的新型国际传播场域的理论 and 现实通路;其次,本研究通过对“韧性”核心要素的考察及其与国际传播系统的结构性耦合,构建国际传播韧性系统框架。最后,本研究将以“韧性”理论为基础,从“适应力”“恢复力”“可持续力”的维度,提出打造国际传播韧性机制的三重进路。在学术层面,本研究以“巴尼时代”作为国际传播场域变迁的新背景,厘清国际传播在内外风险交织环境下的复杂特性,在此基础上地创新性提出“国际传播韧性”的基本理念,为国际传播的未来研究提供独特视角。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挖掘“巴尼时代”国际传播韧性的实践策略,加强对国际传播规律和国际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阐释,以期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到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

二、从“乌卡时代”到“巴尼时代”:全球生态变革下国际传播的场域迁移

当今世界,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治理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将世界历史推到了又一个重大转折点^⑤。学界曾用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为特征的“乌卡时代”描述现代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的挑战与不确定性^⑥,以此作为理解国际传播场域的时代背景。事实上,以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先导,以数字经济为主要产业特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主

要技术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促使全球生态发生变革^⑦。随着全球生态的深层次演化,仅以外部环境特征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乌卡”一词已难以描述当今时代的特征,无法适应内部与外部风险交织的新型国际传播场景。

2020年,美国未来学家贾迈斯·卡西欧(Jamais Cascio)在《面对混沌时代》一文中提出“BANI World”一词,通过与“乌卡”进行比较,他指出“巴尼”是一个描述环境不稳定且混乱状况的框架,代表“脆弱性、焦虑性、非线性和不可理解性”,强调当前人类社会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焦虑和不安^⑧。在“巴尼”的世界里,曾经坚固的结构变得“脆弱”,并且容易在快速变化的外部压力下被打破;“焦虑”成为社会集体的心理特征,代表普遍的不安和忧虑感;“非线性”则是指因果关系不再是线性关系,突出在新环境中的不可预测;“不可理解性”则意味着社会面临的问题更为和错综复杂,往往无法进行简单的解释^⑨。

纵观全球生态场域,“巴尼时代”的各要素在“乌卡时代”的基础上实现了升维构造,它不仅承认环境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还具有脆弱性、焦虑性、非线性和不可理解性的特征,进而建构出涵盖环境、结构、心理等维度的全新图景:第一,“乌卡时代”的“波动性”指要素变化的速度和性质,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但“巴尼时代”的“脆弱性”则意味着即使是看似强大的系统和结构也可能意外崩溃,因此国际传播需要更为强大的“韧性”以应对挑战;第二,在“乌卡时代”的“不确定性”基础上,“巴尼时代”强调个体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情感和心理损耗,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和恐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国际传播匹配受众认知心理特质的战略方法;第三,“乌卡时代”的“复杂性”通常意味着解决方案需要具有多维

表1 乌卡时代与巴尼时代对比分析表^①

维度	乌卡时代 (VUCA)	巴尼时代 (BANI)
起源	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后冷战时代，关注地缘政治	应对包括数字化在内的当代挑战
构成要素	波动性 (Volatility)、不确定性 (Uncertainty)、复杂性 (Complexity) 和模糊性 (Ambiguity)，关注外部因素	脆弱性 (Brittleness)、焦虑性 (Anxiety)、非线性 (Non-linearity) 和不可理解性 (Incomprehensibility)，关注内部和外部动态
视角转变	主要是外部干扰和适应性	延伸到内部脆弱性、心理焦虑和非线性变化
应对方式	适应性 (adaptability)、敏捷性 (agility) 和应对外部变化的反应能力	韧性 (resilience)、焦虑管理 (anxiety management)、拥抱复杂性 (embracing complexity)、解决内部问题
重点	外部环境、市场、竞争、地缘政治	更广泛地关注外部维度和内部维度，包括组织动态
适用性	广泛用于业务环境、战略和风险管理	适用于商业、社会和数字化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

性,然而,“巴尼时代”的“非线性”则意味着国际传播系统内部缺乏明确的因果关系,各种风险后果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使得准确辨别或预测结果具有挑战性^①。在此基础上,国际传播需要接受非线性思维,并对可能没有明确先例的创新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实现传播者与传播对象间的多维信任构建;第四,“乌卡时代”的模糊性是指在解释事件和信息时缺乏清晰度,而在“巴尼时代”,信息是模棱两可且不可理解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往往与传统的分析方法相悖,这意味着国际传播需加强合作和多样化,以创新的方法提高“可持续”传播能力。

三、“韧性”:理解国际传播系统生态的关键视角

在全球生态从“乌卡时代”向“巴尼时代”的演进中,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还需要处理内部的焦虑和不安^②。约翰·洛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öm)等学者曾在全球尺度上提出“星球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概念,以建立“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和增强地球系统的稳定和韧性,从而保护其支持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功能和能力”^③。类似地,在高度互联的现代社会中,国际传播生态系统中某一部分的问题可能会引发跨地区的连锁

反应,更加需要能够承受冲击和破坏的“韧性”机制。“韧性”概念的价值在于引导人们关注不同能力可能带来不同结果,这不仅受到外界冲击事件的影响,更取决于主体在受到冲击时如何做出反应^⑩。换言之,“巴尼时代”国际传播涉及外部环境变迁及内部心理适应性的双重考量,其全要素和全过程需要更加审慎和周密,同时还需塑造更强的“韧性”及应变能力,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来抵御内外部环境的挑战。同时,还需关注应对焦虑感、适应非线性的状况,通过提高信息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以增进理和协作。

(一)何为韧性:基于核心要素的考察

“韧性”(Resilience)一词源自拉丁语“Resilire”,本义为“反弹”^⑪,最初应用于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中。1973年,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将“韧性”引入生态系统稳定的研究,其代表“系统在暂时的扰动后回到平衡状态的能力,是对系统持久性和稳定性的一种度量。”^⑫此后,霍林等学者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动力学视角,将“韧性”界定为系统在面临外来冲击时吸收干扰和重组以保持功能、结构、性质和反馈基本不变的能力,并从阈值(Latitude)、抵抗力(Resistance)、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和跨尺度关联性(Panarchy)等四个方面进行阐释。具体而言,“阈值”是系统在失去恢复能力之前所能改变的最大程度,如果超过阈值,系统的恢复将变得困难;“抵抗力”是指改变系统的难易程度;“不稳定性”是指系统的当前状态和“阈值”的接近程度;“跨尺度关联性”是指一个系统在特定尺度上的韧性取决于高于和低于该尺度的动态影响^⑬。以上四个维度构成了“韧性”的原初框架,并在相关研究的推进中不断深入。近年来,韧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形成“国家韧性”“城市韧性”“社区韧性”等诸多领域的前沿探索,将其作为宏观和微观系统积极应对各类风险与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自身体系变革的适应力、回应力、恢复力与创新力^⑭。此外,韧性还

运用在心理学领域,指代个体快速有效地从压力经历中“反弹”,使用积极情绪从消极情绪经历中恢复的过程^⑮。韧性概念及理论的普遍运用说明了其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和实用性,这是因为韧性概念的特性实际上是与其反面“脆性”相关^⑯。有学者指出,尽管学界对韧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趋向稳态、弹性适应、自我调适等成为多数研究者认为韧性所具备的特质^⑰。由此可见,“韧性”中所包含的有机的、连续性的内涵,为研究传播系统、子系统以及系统中行动者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过程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重要特质。

基于以上综合考察可以发现,“韧性”概念主要包含以下核心要素:第一,韧性包含整个系统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力”。该要素体现着系统动态化的流动过程,其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特质和突发性的状态变化改变内部的结构,使系统具备趋向稳态的能力。第二,韧性具有受到风险冲击时的“恢复力”。即系统在超过“阈值”时,通过内部主要部分的“突变”和改善,弥合系统内外部的能力差异,在维持系统内核的基础上实现弹性适应。第三,韧性蕴含着整个系统长期稳定发展的“可持续力”。在系统常态化的演变中,系统诸要素通过创新性的自我调适匹配其长期发展目标和发展阶段,最终实现系统的突破和迭代。

(二)国际传播韧性:国际传播系统与韧性的结构性耦合

坚持系统观念,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会议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⑱。根据以上对于韧性三大核心要素的提炼可以发现,作为系统的重要特质,“韧性”本身即嵌入于系统的结构性要素之中,并以流动性的方式推动系统的平稳发展。系统综合微观分析法是分析复杂系统中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方法,它描述了具有宏观和微观个体清晰组合的完整系统^⑲。

相应地,国际传播体系是一个综合复杂的非线性动态系统,变量多元且复杂,对其构建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和解决复杂性问题的办法^③。

系统理论的一般框架是肯尼思·博尔丁等学者于1956年归纳得出,成为可供理论话语使用的层次性分析框架。此后,该框架被简化为“物理层”(Physical Layer)“操作层”(Activity Layer)“战略层”(Strategic Layer)三个递进层次。有学者认为,“物理层”是社会所创造出的机械、工业、通信技术等附随的物理形式,强调系统的“技术特性”;“操作层”是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实践的过程性集合,其“演化过程”体现出互动性和延展性^④;战略层则是指系统的战略目标、愿景和实施措施^⑤。基于此,本研究从系统理论的整体逻辑出发,基于国际传播系统的三个递进层次,分析其与“韧性”概念的结构性耦合之处,为国际传播韧性机制构建奠定学理基础。

1. 物理“韧性”:国际传播技术特性上的跨尺度关联

“未来社会是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一体、万物智能的智能社会。智能化不仅是未来信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是推进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重塑产业生态的重要路径^⑥。”全球化与智能化交织下的国际传播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Common World)。新媒介技术所具有的时空延伸、虚实相生、内容共创的典型特质将国际传播嵌入于多维度的跨尺度关联中,在横向维度拓展了国际传播的边界,构成国际传播韧性的底层物理基础。

首先,国际传播的技术升级推动构建从“介入”到“共在”的新型场域,实现公众感知与行为界限的拓宽。在感知层面,生理、心理数据的挖掘实现国际传播效果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用户行为数据、多模态多语种互动内容数据、情感反馈数据、人口特征数据、传播效果数据、关系网络数据为国际传播关键知识的提取和识别提供了可能^⑦。在行为层面,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算法等智能

技术的发展弱化了以往国际传播中各场域的分离状态,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逐步被打破,国际公众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工具,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以快速、便捷的方式“走进”中国,在虚拟的场景中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其次,在智能技术驱动下,国际传播的生产、分发、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得以融合,形成公众参与下的一体化建构。智能媒介技术驱动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场景之间的连接和激活,国际传播呈现出专业引领、共同参与的互动式生态。国际公众能够以互动式的情境参与到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和意义建构之中。具体而言,智媒技术已应用于互动电影、互动表演、视频游戏等多种国际传播类型并实现用户参与,形成从“单向”到“互动”的融合态势。最后,国际传播的技术特性推动文化在时间上的维系和空间上的扩散,通过“文化内生性”打破对抗性的二元叙事逻辑,为国际传播“意义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基础。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传播主体接收、生产和消费文化信息的方式,而且能够影响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旨趣,改变其价值观念及其对文化的理解、接受与传承行为^⑧。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传播通过技术实现的跨尺度关联已深入到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层面,为构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意义共同体”创造前提。

2. 操作“韧性”:国际传播演化过程上的动态调试

韧性强调系统在内外环境扰动下的恢复能力,最终在结果上实现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国际传播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除传播过程所具有的特定要素外,还与技术、文化、经济等要素进行融合互动。此外,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无意识的自组织,由于人类行为在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其行为会在有意和无意中影响系统适应性^⑨。因此,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作为国际传播系统中的能动性主体,同样对国际传播系统产生实际影响,共同塑

造了国际传播在整体演化过程上的动态调试。

在操作层面,国际传播的演化过程突出表现为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有备调试,为国际传播系统演化提供核心基础和条件,能够使系统在变化环境中保持基本架构的稳定,并在常态与非常态的环境中进行转换,动态提升国际传播系统的适应性。第一,国际传播系统根据特定传播状态因时而变。韧性本身是具有层次性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完美状态,它的作用在于对危机情境的适应意义^③。国际传播的时间选择是传播致效的重要因素,基于时间点在操作层面的静态分析在风险情境下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例如,面对认知战、舆论战的风险情境,国际传播的操作层由单纯的信息传递转化为对于公众认知资源的争夺,通过情境的转换改变操作策略,以期使公众在实现信息接受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认同。第二,国际传播系统根据媒介生态发展趋势因势而变。换言之,国际传播通过适应不断调整的外部形势保持生命力。复杂系统并非天然地产生自组织和秩序涌现,其本身具有脆弱性特征,即紧密耦合的子系统间非合作性博弈导致熵增^④。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算法等技术通过连接与再连接特性实现对于社会个体的赋能赋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微粒化”状态,传统传播者中心化的策略已逐渐被消解,个体都参与到传播的全过程,国际传播中多元主体协同的策略已逐步成为共识。第三,国际传播在资源储备上有备调试。内容与人才是国际传播系统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储备,为国际传播规模的伸缩空间和韧性塑造提供支持。聚焦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国的文明形态、典型实践以及在概念生成、语际转换、内容表达等过程中形成的语言符号系统具有丰富性,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供给。此外,作为软实力资源大国,中国拥有较为充足的媒体资源、不断增长的技术人才支撑,这些都为中国

国际传播叙事提供有效帮助^⑤,使得国际传播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针对性传播方面实现有备调试。

3. 战略“韧性”: 国际传播宏观方略上的可持续性

国际传播韧性作为一种长期性、持续性的概念,不仅表现在国家面对冲击的短线时间轴上,还蕴含于国际传播常态化发展的长远轨迹里。从时间维度看,“韧性”不仅是一种静态能力(Ability),更是一种不断推进且持续的动态过程(Process),它作为一种有效的解释性工具嵌入到国际传播的宏观方略。系统协同是网络社会的底层逻辑,也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逻辑,同时也应成为对国际传播的实践逻辑^⑥。

具体而言,我国国际传播的可持续性体现在以开放包容为特质的理念创新和以融合传播为方案的矩阵创新,二者从理念价值和系统策略双维度契合了“韧性”概念的终极目标。一方面,发展传播学视角下的国际传播体系是开放包容特质的典型表现,体现出“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意涵。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⑦,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中国国际传播的可持续性,即以包容性、创新性的价值逻辑开展传播实践。因此,“人类共同价值”秉持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以“和合思维”重构文化价值,挖掘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对抗性叙事框架的修正^⑧。此外,国际传播的全局理念,吸纳和连通包括社会精英和民间力量在内的各方主体,能够扩大贯通东西的“朋友圈”,共绘和平发展的同心圆^⑨,为国际传播韧性的可持续提供价值基因。另一方面,在理念价值的指引下,以传播媒介、平台媒介、智能媒介优势互补打造的融合传播矩阵助力形成多元主体、多方互动、复调传播的大外宣格局,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的系统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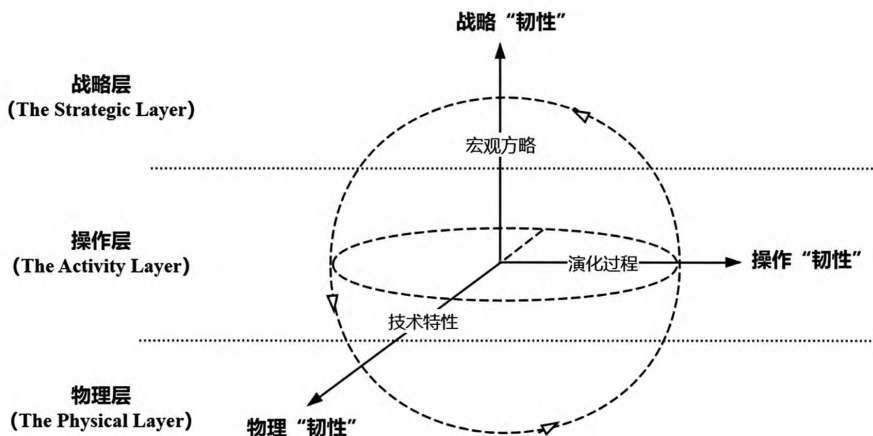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传播韧性系统框架

略,为其应对国际舆论场中的风险和冲击提供战略支撑,在国家形象建构、国际话语权争夺、国家品牌打造等方面发挥作用,进而参与国家情感、价值观的传播中,进入构建国际传播秩序的全新阶段,成为国际传播韧性的战略性耦合要素。

四、国际传播韧性机制构建的三重进路

当前,不断迭代的国际传播系统具有“自组织”特点,且是一个动态流动的过程。在“巴尼时代”场域下,韧性理念的嵌入使得国际传播格局建设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变,通过增强适应力、恢复力和创新力实现认知转换、信任搭建、多点协同,使国际传播系统能够与不断变化的风险情境实现适应性平衡和过程性创新。同时,该视角将推动国际传播跳出工具属性,致力于形成复合价值体系,实现国际传播的系统革新和价值升维。以国际传播韧性系统框架的三个层次为底座,根据韧性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延伸出“适应力”“恢复力”“可持续力”的三重进路。其中,物理层通过传播技术的搭建实现国际传播的基础“适应力”,操作层以动态特性为依据,以流动性过程打造风险情境下的国际传播“恢复力”,操作层则在宏观方略上与“可持续力”相匹配,构建国际传

播韧性系统的循环演化格局。三重进路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国际传播韧性系统中的功能链条搭建,推动解决国际传播趋向稳态、实现自我调适、增强弹性适应能力的重要议题。

(一)“适应力”:实现国际传播与个体认知图式的匹配

适应力是国际传播系统应对不同风险变化时有效化解风险为导向的重要性能。^⑧在“巴尼时代”下,国际受众不再是无差别的均值人或者是被抽离掉特殊性的“抽象人”,而是更彰显差异的“微粒人”或者“单体人”。当前,随着拉平世界层级的信息技术进入到舆论场,拥有独异思维的“超级个体”成为传播中更高地位的一方,因而产生“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局面。

个体认知具有特定的图式和结构,会根据内部已有的认知经历对外部信息进行调整和选择性接受,它体现着个体信息选择的主体性和能动性^⑨。因此,国际传播中公众认知需要以“中间环节”纳入到国际传播效果的研究。传播范式从传统的“信息竞争”过渡到“认知竞争”,认知竞争是促进舆论场分化和重构、自组织和再组织的重要推动力。在当前国际传播认知转向下,传统信息竞争所抢夺

的“信息”开始消解,国际传播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明确传递内容是否能够触达个体认知图式,是否能够符合个体的认知结构。在增强国际传播系统适应力的过程中,需将认知变为增强国际传播系统适应力的过滤器和撬动点,以搭建共同的认知地图影响国际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也就是说,认知图示会形成“支点”效应,当个体进入到认知坐标系后,之后的信息元素会呈点状自动编织进该框架产生传播效果^⑩,在无数个“支点”相互聚集的过程中,国际传播系统的适应力也不断强化。

(二)“恢复力”:以“持续型信任”扩展“共同体理念”

恢复力是国际传播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重建能力,是在风险发生之后快速恢复的性能,而信任是弥合内外部系统能力差异的重要因素。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异同是根本性、长远性的,有的是本质不同,有的是程度问题^⑪。在国际传播中,信任是预测传播关系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传播系统产生连接与交互的关键基础,是一种随着社会关系出现或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应然属性。当前,国际传播中的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人们对于信任的获取打破了地域、场景、时间的限制。在“巴尼时代”这个充满变数的传播环境中,信任的逻辑并不是必然或确定,而是一种可能性的同步,国内国外两个传播系统需要建立稳固的信任才能具备更强的韧性。^⑫于个体而言,国际传播需要准确把握个体自身的个性化需求,强化信任要素的个体属性;于媒介而言,传播技术和国际环境的高层次迭代使得媒介在信息汇冲之中产生涌现的传播能量,国际传播的共生边界由横向跨越变为纵向延伸,这需要强化信任要素的协同属性。

国际传播信任的构建过程包括初始型信任(Initial Trust)和持续型信任(Continuous Trust)^⑬。初始型信任是对于目标主体认知不充分的条件下进行预期责任的一种行为,信任方会基于先前的

认知判断作出理性决定进而扩展信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根植于中国、融入了世界文化背景,通过传播的连接机制扩大影响范围,在国际环境中形成了初始型信任。持续型信任则发生在交互之后,是目标信任主体积累了一定的认知条件,在具体的情境下完成互动行为。当今世界诸多领域依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只有求同存异、凝聚共识,才能超越文明隔阂,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通过“共同体理念”影响国际经验,是从认知层面进行社会观念拓展的方式^⑭,在国际传播中将持续性信任的互动结果加入反馈路径之中,能够超越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在精神层面实现传受双方的信任与共识,进而增强国际传播面对风险情境时的恢复力。

(三)“可持续力”:推动国际传播“痛点—痒点—兴奋点”的循环演化

可持续力是韧性国际传播系统在宏观方略层面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国际传播系统每一次循环都是一次反馈回路,都是国际传播系统自我恢复和持续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所以,国际传播系统的韧性并不仅仅是线性、机械性地重复原有的状态,而是通过不断的改进进一步提升能力,这便是可持续力的本质内涵。因此,国际传播系统应当总结既往的经验,通过“痛点—痒点—兴奋点”的内核,提升韧性系统的可持续力。

国际传播中的“痛点”是当前受众没有被满足的即时需要,通常会带有强烈的迫切感。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看得见”的“痛点”问题,通过先“求同”后“存异”找到“同”的立足点,进而“润物细无声”地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建构我们的价值观。“痒点”是国际受众的潜在需求,是受众心中的“想要”的部分,痒点解决的是“看得下去”的问题,其关键作用是制造不满足感,这要求国际传播需提供创新、改进或者额外价值,找到传播内

容的引爆点,既要让国际传播用户接收到内容,还要产生文化共振、心理共振和情感共振。“兴奋点”是受众没有预期到的惊喜、超出期望的积极体验,“兴奋点”解决的“看得有用”的问题。国际传播的内容富含强烈的“非理性”因素,讲道理的方式往往无法实现中国故事的“有效供给”,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受众在信息编码和解码时的难度系数。因此,国际传播在观念上要产生一种向心力、凝聚力,需掌握横向沟通和纵向整合的能力,摒弃功利性视角,触发国际受众的情感启发式思考,进而将绝大多数的国际受众整合在一起。“痛点—痒点—兴奋点”在实际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并不是简单的层级结构,而是系统化、集束性的循环演化,更是增强国际传播系统“可持续力”的根本。

五、结语

巴尼时代的到来为国际传播增添了更多的不可控性与不确定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之下,我国国际传播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巨大考验。国际传播是一个生态圈,从每一个“初级节点”进化到“中级节点”,再到更高层次的“超级节点”,每个节点的协同共生能力和价值创新能力都决定了国际传播生态圈的演化进程。因此,增强国际传播系统的韧性,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响了难信任”的被动局面,通过“适应力、复原力、可持续力”构建国际传播韧性机制,是当前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抓手和有效途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圈群生态视阈下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BXW04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从‘乌卡时代’到‘巴尼时代’:中华文明对外传播韧性策略及效果评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鄧慧: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滕文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21-22[EB/OL]. (2022-09-08). <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21-22>.

②容志、宫紫星:《理解韧性治理的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政策与组织维度的分析》,《探索》2023年第5期,第119-133页。

③Doerfel, M. L., Kim, M., Kwestel, M., Yoon, H., & Quow, J. Resilience organizing: a multileve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2年第6期,第605-618页。

④李建军、刘会强、刘娟:《韧性传播与间歇传播:国际传播的新视角——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为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45-149页。

⑤史安斌、童桐:《“乌卡时代”战略传播的转型与升维》,《对外传播》2022年第6期,第14-17页。

⑥Taskan,B.,Junça-Silva,A.,Caetano,A. Clarifying the conceptual map of VUCA: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2022年第30期,第196-217页。

⑦唐爱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意识形态战略选择》,《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4期,第78-84页。

⑧De Godoy, M.F., & Filho, D.R. Facing the BANI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trology*, 2021年第14期,第e33页。

⑨Monica.What is BANI World? Difference b/w BANI And VUCA.[EB/OL]. <https://learntransformation.com/what-is-bani-world/>

⑩Natalia, H., & Olena, M. The Key Administrative Competencies of Managers Required for Company Development in the Bani World. *ECONOMICS*, 2023年第11期,第289-305页。

⑪Stefan F. Dieffenbacher. BANI World: What is it and Why We Need it?[EB/OL]. <https://digitalleadership.com/blog/bani-world/>.

⑫李志刚、刘一苇:《“乌卡时代”和“巴尼时代”叠加期的韧性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新经济》2023年第10期,第81-91页。

⑬Rockström, J., Steffen, W., Noone, K.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461, 2009年,第472-475页。

⑭Béné, C., Riba, A., & Wilson, D. Impacts of resilience interventions—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al assessment in Nig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

ter risk reduction, 2020年第43期,第101390页。

⑮Braes, B., & Brooks, D.J. Organisational Resilience: understanding and identifying the essential concepts. WIT Transactions on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11年第117期,第117-128页。

⑯Holling, C.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1973年第4期,第1-23页。

⑰Walker, B.W., Holling, C.S., Carpenter, S.R., & Kinzig, A.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年第9期,第5页。

⑱刘雪莲、肖晨卉:《从国家到国际:国际关系中“国家韧性”的研究视域》,《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第100-109页。

⑲Tugade, M. M., & Fredrickson, B. L. Resilient individuals use positive emotions to bounce back from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年第2期,第320-333页。

⑳马俊毅、杨一凡:《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索》2024年第1期,第27-40页。

㉑易承志、龙翠红:《风险社会、韧性治理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文杂志》2022年第12期,第78-86页。

㉒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03/content_5557023.htm, 2020-11-03。

㉓Sunny, Y. A. Foundations of Complex-system Theories: In Economics, Evolutionary, and Statistical Phys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1998年,第12-14页。

㉔王辉、沈伟威:《WSR系统方法论视阈下中文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和优化策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59-69页。

㉕陈智:《韧性视角下ChatGPT应用的技术特性、演化过程与治理方略》,《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年第23期,第111-120页。

㉖Zhang, X., & Zhang, Z. How Do Smart Villages Become a Wa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Smart Village Planning and Practices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20年第24期,第1-20页。

㉗邵培仁:《主动智能化:中国媒体发展繁荣的新引擎》,《现代视听》2019年第4期,第82页。

㉘汤景泰、徐铭亮:《论智能国际传播:实践模式与驱

动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2期,第152-160页。

㉙段鹏、宋芹:《文化内生力语境下国际传播创新路径的三点反思》,《现代出版》2023年第1期,第1-7页。

㉚Levin, S. A. Ecosystems and the biosphere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Ecosystems, 1998年第5期,第431-436页。

㉛于肖楠、张建新:《韧性(resilience)——在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心理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5期,第658-665页。

㉜齐善鸿、乐国林、刘金岩等:《基于熵与自组织理论的突发事件分析模型》,《科技管理研究》2006年第10期,第238-241页。

㉝周庆安、刘勇亮:《多元主体和创新策略: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第21-28页。

㉞胡正荣、王天瑞:《系统协同: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逻辑》,《新闻大学》2022年第5期,第1-16页。

㉟郑明达、范思翔、成欣:《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看中华文化开放胸怀》,人民日报2023年6月16日,第6版。

㊱李明德、乔婷:《中国国际传播:历史演变、现实背景与前沿问题》,《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23-135页。

㊲史安斌、朱泓宇:《发展传播学视域下主流媒体跨文化话语体系理念升维与创新路径》,《电视研究》2023年第5期,第20-24页。

㊳佟德志、樊浩:《韧性城市治理的五星模型——基于“全球韧性百城”项目案例的扎根分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43-57页。

㊴喻国明、邝慧:《理解认知:把握未来传播的竞争重点、内在逻辑与操作路径》,《编辑之友》2023年第3期,第58-65页。

㊵喻国明、刘或晗:《从信息竞争到认知竞争:策略性传播范式全新转型——基于元传播视角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128-134页。

㊶谢金文:《从信任的视角看国际传播》,《媒体融合新观察》2021年第5期,第18-21页。

㊷喻国明、滕文强、武迪:《价值对齐:AIGC时代人机信任传播模式的构建路径》,《教育传媒研究》2023年第6期,第66-71页。

㊸朱翼:《行为科学视角下人机信任的影响因素初探》,《国防科技》2021年第4期,第4-9页。

㊹周敏、邝慧:《演化、互构与协同:气候传播的系统认知与现实向度》,《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2期,第87-100页。

(责任编辑:王珏)